



1894~1915:

梦想与 困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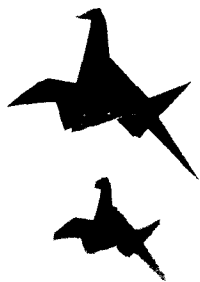
马 勇 著

著者以现代化的理念去探讨1894年至1915年间的中国思想史，获得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此前的中国在经受了鸦片战争及其之后的短暂困难，至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中国已基本上步入近代化的轨道，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军事实力方面已经获得长足的发展。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尤其是精英阶层产生“世纪末”的恐慌，中国向何处去一时间成为新的热点话题。各种新思潮蜂拥而至，在政治层面则先后爆发戊戌维新至袁世凯帝制自为等一系列运动。本书则是根据历史事实对这些思潮与运动进行的分析。

中国干部
最新文库

中国干部最新文库

马 勇 主编



1894~1915:

梦想与困惑

马 勇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1894~1915: 梦想与困惑/马勇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1

(中国干部最新文库/马勇主编)

ISBN 7-222-02587-1

I. 1... II. 马... III. 思想史—研究—

中国—1894~1915 IV. 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2936 号

责任编辑: 吉 彤

装帧设计: 西 里

·中国干部最新文库·

1894~1915: 梦想与困惑

马 勇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开本: 850×1168 1/32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张: 8.625
云南新华彩印厂 印装	字数: 184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数: 1—5000 册

ISBN7-222-02587-1/K·290

定价: 15.80 元

内容提要

著者以现代化的理念去探讨 1894 年至 1915 年间的中国思想史，获得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此前的中国在经受了鸦片战争及其之后的短暂困难，至 19 世纪 60 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中国已基本上步入近代化的轨道，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军事实力方面已经获得长足的发展。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尤其是精英阶层产生“世纪末”的恐慌，中国向何处去一时间成为新的热点话题。各种新思潮蜂拥而至，在政治层面则先后爆发戊戌维新至袁世凯帝制自为等一系列运动。本书则是根据历史事实对这些思潮与运动进行的分析。

作者简介

马勇，1956 年生于安徽，1986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1992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青年优秀成果专著类二等奖）、《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梁漱溟评传》（1992 年获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1995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专家提名奖）、《中国儒学》（第 1 卷）、《秦汉学术：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探索》、《梁漱溟传》、《蒋梦麟传》、《旷世大儒董仲舒》等，另发表论文数十篇。

前 言

全球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向跨世纪的中国领导干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难得的发展机遇与严峻的挑战形势，要求中国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必须加强理论学习，以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必须掌握当代世界发展的各种新知识，更新知识和观念，以提高自身的领导素质。从总体上说，目前中国的干部素质还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正因如此，中共中央反复强调，必须从国家建设和民族兴亡的战略高度，解决中国高中级干部的学习问题，普遍提高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也正因如此，我们组织了这套《中国干部最新文库》，力图为提高中国领导干部的素质尽一份绵薄之力。

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发现、分析、探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亟待解决的重大经济社会问

题，提出解决这些新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模式，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紧迫感和危机感来增强中国领导干部对时代的感受力、判断力和决策力，这是《中国干部最新文库》的宗旨之一。

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高度，介绍、分析、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概念、新知识和新情况，充实各级干部的学科知识，拓宽其认识视野，提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使中国的领导干部对外部世界保持快速敏捷的反应能力，这是《中国干部最新文库》的宗旨之二。

目前，坊间流行的干部读物并不少见，但真正适合中国干部需要的读物则不多见。何故？简言之，这些读物太拘泥于教条式的宣传与教育，很少有新的突破与创新，且多带有八股腔调，文字生涩，令人读之生厌。正是有鉴于此，我们这套《中国干部最新文库》在强调干部读本的现实性和理论性同时，特别注重读本的创造性和前瞻性；在注重读本的学术性、科学性同时，特别注重读本的普及性和趣味性。

我们的组稿思路是：对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和中国干部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实证性的分析，力求提出创造性的新阐释和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从人类全部历史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视野出发，总结、预测中国及世界社会发展的趋势及可能存在的问题；用通俗、准确、精炼、生动的语言，将国内外最新学术成果介绍给中国领导干部，使之获得思想上的启迪，并引发他们对中国现实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已有的干部读物大多按学科组织，按教科书编写。本文库不拟重蹈覆辙，而是充分相信中国领导干部已有的文化素养，不在常识问题上纠缠不休，而是尽量给于

部提供新知识、新观念、新思想。这些新知识、新观念、新思想只要对我们新世纪的干部有一点启发，使我们的干部愿意就这些新知识继续学习，对这些新观念、新思想继续思考，那么我们的这套《文库》就算达到目的了。

为了保证这套《中国干部最新文库》的学术理论的领先性、选题涉猎的广泛性、撰稿队伍的高层次性，我们在北京邀请中宣部、中组部、国务院部委研究所、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有关专家进行了多次座谈，不断完善《中国干部最新文库》的策划方案和选题方向；邀请一批学有专长的中青年专家学者撰稿，并建立了严格的书稿审读专家负责制。

我们真诚地期望通过这套《文库》本身的魅力赢得中国领导干部的青睐，也真诚地祝愿跨世纪的中国领导干部通过阅读这套《文库》，成为走向世界的新一代政治家。

序

历史的发展总是呈阶段性的螺旋上升态势。在平静中孕育着突破，经过突破却又往往回复到先前否定过的阶段。当然，这仅仅是就形式而言。因此，历史研究与历史解说的复杂性往往不在于我们是否认识到了“历史真相”，而在于我们能否透过“历史现象”本身观察那些“已变”和“不变”的本质与内涵。

近代百年的历史时段里，关键的年份有几个格外值得关注。其中 1894 ~ 1915 年，就是近代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在这短短的二十年里，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的急剧性的变化：先是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洋务运动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然而几乎在“一夜之间”却不敌东邻日本，不仅经过几十年建设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且连清政府能否继续“合法性存在”都受到了人们的质疑，

于是有甲午战败后启蒙思潮的发生，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崛起，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思潮的萌生。正是在这些思潮与运动的催生下，终于迎来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光绪皇帝的胆略与勇气一时间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不幸的是，戊戌变法仅仅存在了一百天，便被西太后轻轻一击而推翻，中国历史似乎回复到变法运动之前。

西太后的镇压使进步的中国人感到失望，可是正当这种失望继续蔓延的时候，却不料西太后自己宣布了“新政”，公布了“筹备立宪”的时间表，确定以清政府为主导继承戊戌维新运动的精神遗产，推动中国继续前进，清王朝也似乎在这种变革的氛围中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20世纪初年的“新政”在近代中国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教育等方面在制度层面的变革差不多都兴起于这一时期。然而当新政的日程表还没有最后排定的时候，新政的政治目标尚未实现的当头，而新政的“主体”清政府却在“一夜之间”被“一个只不过是由士兵组成的团体成功地发动一场并无充分准备的革命”^①而推翻，中国历史又一次发生重大转折。

清政府被推翻之后，建立了民国，民主共和的新体制开始在中国建立。然而中国人仅仅经过一个为时并不太长的高兴，便又一次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先是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接着则是1915年的袁世凯“帝制自为”运动，历史经过短短二十年的

^①（美）A·W·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上、第437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周折”，却又回到了它的起点。难道中国只能实行“帝国”的政治体制吗？中国人难道只能在“皇恩浩荡”的荫庇下做“顺民”吗？中国人经过二十年的“折腾”又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从上述情况看，1894~1915年的中国政治发展，不仅构成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一个分水岭，而且实在是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一个缩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全面地阐释这二十年中国政治变化与思想变化的内在关联，便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章 中国的惟一希望	1
可怕的预感	2
内耗与日俱增	7
浪漫的政治理想	12
变革的极限	17
中国惟一之希望	22
历史的偶然	24
民族与种族	29
第二章 谁能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36
西太后为何翻脸	37
从器物到制度	40
谁来承担甲午战败的责任	46
保国与保种	52
列强在中国的目的	59
权与利：政变的本质	66
谁是保守主义者	70
留给历史的遗憾	81
第三章 中国现代化的诉求与失望	118
清政府的两难选择	119
谁是改革的阻碍者	125
皇权与民权	130
立宪与共和	135
革命与改良	140
理想与现实	148
第四章 政治现代化的尝试与失败	155
现代化的必然诉求	156



	权力危机	160
	解决权力危机的两种思路	167
	学理探讨与政治运作	173
	政党政治的竞争规则	180
	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	184
第五章	现代化的思想资源	205
	意义世界的丢失与寻求	206
	信仰的崩溃与重构	213
	权威的丧失与恢复	220
	新传统主义的泛起	225
	国体虽更而纲常是否必变	229
	对共和与文化传统内在关联的迷惑	237
	新传统主义的困境	246
	反传统思潮的崛起	251

第一章

中国的惟一希望

当历史迈入 21 世纪的时候，我们回首往事，总结 20 世纪的利弊得失时，我们不禁看到，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不论国内斗争如何激烈，20 世纪的中国实际上都在现代化的轨道上艰难地进步着。只是这一进步的步伐，有时快些，有时慢些而已。

步伐的快慢取决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些原因一些来自外部世界，一些属于国内因素，它们的背景也不可一概而论，需要具体的分析与研究。但是有一条至关重要，那就是 20 世纪的中国是既往历史的必然延续，它的所有问题与难题虽然均具有复杂的内外原因，但在本质上都与中国的历史遗产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准确地说，20 世纪的中国问题与难题都直接导源于 19 世纪，尤其是 1894 年甲午战败之后的最后几年。因此，当我们回顾 20 世纪的中国发展时，不能不从甲午战争讲起，

不能不追论 19 世纪末年的中国政治遗产，以期既可以明了 20 世纪中国之所从来，又有助于弄清 20 世纪中国问题之所在。

可怕的预感

在 19 世纪还剩下最后几年的时候，中国人普遍具有一种莫明其状的恐慌感。他们不是觉得世纪末日将要来临，而是在追怀 19 世纪的中国发展时，深感屈辱、痛心与后悔。

确实，18 世纪的中国，虽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好年代，但这一个世纪毕竟是有清二百余年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不仅康、雍、乾的个人作为以及种种外在条件充分保障了清王朝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而且，与 18 世纪相终始的康、雍、乾三朝确实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诸方面建立了赫赫功绩，中华帝国虽不能说真正达到“万国来朝”的中央帝国的标准，但 18 世纪的中国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毕竟是一个强大而不容忽视的力量。

1799 年 2 月 7 日，乾隆皇帝驾崩养心殿。伴随着他的去世，不仅是中国光辉灿烂的 18 世纪的结束，而且预示着 19 世纪的中国不可能继续繁荣昌盛，可能是日趋衰落。最具有象征意味的是他的那首绝笔诗，这首诗题为《望捷》，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渴望清王朝依然像他的早年那样辉煌强大，然而事实情况却是，全国此

时士气低落，防务松弛，经济衰退，破绽百出。^①

继乾隆而立的嘉庆皇帝，虽然生性柔弱与顺从，但他继位之后，也确曾试图改变清王朝的衰败趋势，无奈积习已深，阻力重重，终嘉庆一朝，不仅衰败趋势并未终止，而且内政外交都面临更加棘手的难题，陷入较乾隆末年更为严重的困境，为此后中国的发展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到了19世纪中叶，这些隐患终于相继爆发。中国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革命的双重打击之后，几乎一蹶不振，危在旦夕。痛定思痛，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接受曾国藩等开明官僚的建议，采取相对开放的政策，企图以洋务运动的推广而重振清王朝的雄威，恢复中华帝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了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应该说清政府的实力确有一定的发展，它的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就连法国的一些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几个大强国之一，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中国的强国地位。^②

中国综合国力的恢复与强大是客观事实，然而，这种强大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随心所欲地打遍天下无敌手。事实上，在中国的国力得到恢复的同时，清政府内部也正在成长着一种目空一切的虚骄和中

① （美）A·W·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中、第140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参见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1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华帝国所惯有的奢侈与浪费。于是经过 1894 年的中日战争，“仅仅几个月的功夫，它（指中国）就不得不从傲慢的梦中惊醒，而且发觉它并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①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这一结果不仅出乎清王朝统治者的预料，而且与中日双方国力的对比也不相符。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本来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只是由于清朝统治者的决策错误，胜利的成果才被无端地葬送，中国由此而蒙上空前的奇耻大辱。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或偶然因素，并不是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的必然结果。然而，割地、赔款毕竟是不容抵赖的事实，清政府主政者尤其是李鸿章等人应该承担失败的责任也是情理中的事。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假如中国不是败给日本，而是像鸦片战争那样败给西方诸强中的某一大国，中国人的感情或许容易理解和接受。事实上，在此之前几十年的类似的结果也多次在中国与西方诸强中的交涉中时有发生，但它都没有发生如同甲午战争之后在中国人民中所引起的震荡。这一次则不然。堂堂的中华帝国竟然惨败在被中国人素来瞧不起的东邻蕞尔小国之手，它理所当然地激起中国人的抱怨、愤怒与谴责。康有为说：“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为小夷侮侵削，若羊缚豕，坐受剥割，耻既甚

^①（法）A·施阿兰：《使华记（1893~1897）》第 12 页，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

矣，理亦难解。”^①这大体上代表了一般中国人的共同心声和困惑。

既然中国的综合国力并不比日本弱，既然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本来可以获得最后胜利，那么，中国人如果能够冷静地反省一下这次战争失败的责任，客观地探讨一下这次战争失败的主客观原因，问题或许并不致于如后来那样复杂化。然而，素有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传统的中国人，虽然早在两千年前就已认识到“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一浅显的道理，但他们在心理上却无法接受惨败于日本这一“弹丸小国”的事实。于是，他们的思维倾向不是积极地面对既成事实，隐忍一时之耻辱，更图异日之自强，卧薪尝胆，十年图报，而是舍近求远，试图寻求某种终极原因，试图建立某种根本解决的方案。

循此思维路向，国人在甲午战争后的基本反应，不是探讨战争失败的主客观原因与背景，不是以忍辱负重的精神面对现实、面对未来，而是企求一种根本解决方案，甚至觉得战争之所以失败，不仅是清政府主政者策略上的错误，而是他们几十年来“基本国策”的路线错误。于是乎，国人把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清政府几十年来的洋务新政，以为洋务新政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只治其表，不治其本，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有待于中国能否从根本上放弃固有的旧体制。梁启超写道，前此三十余年洋务新政“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康有为政论集》第14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